

转折的力量：

# 遵义会议题材绘画的图像叙事

朱剑

表现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美术中的重要题材。以遵义会议为主题的绘画作品，通过艺术家的出色创意，越来越呈现出不可替代的魅力，这里介绍几件重要的表现遵义会议题材的绘画作品。

## 走向胜利

彭彬创作的油画《走向胜利》，作品采用了情节性叙事，属于古典叙事的典型。作品所表现的场景是会议结束之后，朝阳映照下，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三位与会者依次走出会场的样子。他们穿着整洁，面容也更显丰满与年轻。

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画中的毛泽东头戴红军的八角帽，手上还拿着一顶草帽。不难发现，这顶草帽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它不仅没有历史依据同时也不具有实用意义，所以必然属于一种象征物。那象征什么呢？答案不妨从另一件作品开始寻找。

1960年，画家李琦曾创作过一幅中国画作品《毛主席走遍全国》。画面上的毛泽东主席手中，就拿着一顶草帽。事实上，“草帽”本身就具有特定寓意。当其于领导干部结合在一起时，便具有了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的涵义。故而，草帽形象在相关题材的美术作品中，往往也是蕴含此类涵义的图像符号。在此，《走向胜利》中毛泽东手中的草帽与《毛主席走遍全国》中毛泽东手中拿着的草帽都具有强烈的符号性，寓意一致。

沈尧伊在2006年创作油画《遵义会议》。这件作品根据著名作家魏巍的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来还原历史事件现场。基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体会，创作者在将文字转化成图像的过程中进行了想象发挥。比如表现会议召开时，本来摆得很整齐的椅子被拉得松松散散，与会者或站或坐，十分符合过惯战争生活和游击生活的人的性格。

在这里，道具充分暗示了会议的气氛和人物性格。据与会者回忆，遵义会议始终洋溢着民主的气氛。而作品中那看似随意的人物布局、表情、动作以及由此形成的视觉关系，恰恰生动再现了当时的氛围。

再看画面主体部分的窗外，明显表现的是黑夜，但画面最右部分回廊尽头的窗外，却又隐约可见一片明媚阳光。这



▲ 2003年 吴山明、何士扬、吴激扬 中国画 《遵义之春》

种看似矛盾的时间表达，恰恰是画家的匠心所在：空间上，回廊位于会议室的转折处，寓示遵义会议的“转折”意义；时间上，回廊尽头的明媚阳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将从此走向光明。会议室内上方，还弥漫着一团团的烟雾，画家却处理成一种正在逐渐散去的视觉效果，以此“云开雾散”的感觉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相匹配。正是以上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这件作品图像叙事的独特视角以及令人击节的创意。

## 遵义曙光

2016年杨参军、井士剑、任志忠、周小松主创油画《遵义曙光》。这件作品描绘会议结束之后，与会代表们会后走到室外走廊眺望远方的场景。

众所周知，“转折”是遵义会议的历史性意义所在。而创作者正是对“转折”进行了视觉呈现。在画面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四个“转折”：一是会议结束即会议状态的转折，二是昼夜交替即客观时间的转折，三是凝重与轻松，即与会代表们状态的转折，四是由室内到室外即空间状态的转折。

从这四个转折中，晦暗与光明、逼仄与宽阔形成鲜明对比，加上画面人物站立远眺，憧憬未来的情境引导，最终使创作意图在此巧妙的图像叙事中得以呈现。作品的细节也辅助了图像叙事的完整，比如画面中有两种光源，一是会议室内透出的灯光，另一个是清晨青紫色的天光，一左一右，一冷一暖，不仅赋予画面色彩节奏的丰富变

化，而且灯光的微弱与天光的铺满对比也暗喻着局促过往的结束与光明前途的到来。再如画面的视角也成为叙事特色。虽然画面基于写实手法来完成，但突破了传统焦点透视的限制使视域扩至180度广角，这样让室外走廊的空间看上去显得十分开阔，特别是屋顶拱券的大圆弧形与会议室内的小长方形在视觉上几乎并置，让室内室外俨然有新旧两个世界的感觉。再者，屋顶拱券、远山轮廓和室外房角的平行直线之间构成的富于张力的穿插关系，同样在叙事上引导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向感。

2003年吴山明、何士扬、吴激扬合作中国画《遵义之春》。它不同于以上介绍的三件作品，而是属于现代叙事类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件作品中，笔墨语言走到前台，成为图像叙事的主角。

表面上，《遵义之春》属于古典叙事类型的范畴，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古典叙事的元素一个不少。创作者选取与会者走出会场的那一刻，20位与会者站立在画面中，背景则是那幢小楼的一部分。

但是，作品最令人难忘之处，乃是主创吴山明所说的：“首先是笔墨和主题的结合，笔墨和人物塑造如何结合。”画家几乎完全采用宿墨。宿墨就是隔夜的墨。其特点是色泽浓黑，且开始脱胶，画在宣纸上水渍漫漶而笔痕犹存，水墨分离的效果自然而产生了一种陈旧气息。正是凭借宿墨所呈现的特殊视觉效果，画面中的点、线、面的符号学意义开始凸显，造型

重心也随之从形貌转为结构，体面变为笔墨。笔踪、墨迹、水痕相互渗透，既塑造了形体，又表现了明暗，与环境也实现了衔接。尽管整件作品以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和写实技法为主导，但笔墨仍然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叙事语言而存在。那些宿墨线条带来的水晕，水印，水渍，水痕，水洒所营造出视觉效果，仿佛经历了风雨洗尘的岁月留痕。

《遵义之春》表现的具体时间是初春的清晨，本应是一个天色刚亮，寒意逼人的场景，但这样的场景感受根本无法直接通过画面被传递出来。于是，笔墨本身被凸显了。在此，不仅图像叙事类型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折，中国画这一独特的传统艺术也通过与西方创作理念和创作技法的融合而实现了审美意蕴的呈现。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题材的绘画作品，其图像叙事需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分析、历史细节探究以及对环境、道具、氛围捕捉等科学实证的基础上，并在这种尽可能还原的历史真实基础上赋予画面象征性结构，建构出更高层次的叙事性。在解读这类作品时，亦需要在观念史、概念史乃至社会文化史层面寻求分析策略，从而对图像所蕴含的信息进行深度挖掘，才能真正深刻、全面地了解作品，并从中体会到民族审美和民族精神的高度、力度和深度。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馆藏品征集部主任，美术学博士后、艺术学博士后）

## 哈氏风筝“彩蝶”

刘莹



彩蝶 哈氏风筝 103×118cm 哈亦琦捐赠 中国美术馆藏

北京是著名的风筝产地之一，哈氏风筝是北京风筝的重要流派之一，被称作“风筝哈”，创始于清末，历经四代传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件彩蝶风筝由“风筝哈”第三代传承人哈魁明1951年复制，其原型由哈氏第二代传人哈长英创制，曾在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银奖。

此件作品属于软翅类风筝，即翅膀上缘有竹条，下缘无竹条。软翅风筝按翅膀层次又可派生出单层、双层及多层软翅，主要扎制飞禽、昆虫等仿真类造型，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夸张、变形，并以“活眼”（又称转眼，即眼睛的装置是活的，可以随风转动）装饰，其翅膀下缘为软边，放飞时在

空中随风摇曳，更加适宜高空远观之效果。

“风筝哈”的软翅风筝较之其他风筝流派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其翅膀向上、向外翘起，膀尖骨架弯曲部分弧度加大，这样的设计可以加大风筝翅膀的迎风面，使其在放飞时不会因为风力过大而导致翅膀下垂，增强了软翅风筝抵抗强风的能力，从而提高放飞性能。

哈氏风筝另一特点是色彩丰富，画工精致。这件作品采用对称构图，蝴蝶翅膀由多层连续图案组成，勾勒细腻，细节处运用了哈氏风筝所特有的、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绘画技法“秃笔丝毛”，即用修剪成秃笔状的笔尖擦绘出鸟类羽毛或动物茸毛，使之呈现出栩栩如生的写实效果。

## 彩塑“白蛇传·断桥”

王伟



白蛇传·断桥 喻湘涟、王南仙 彩塑 14×15.5×8cm 1985年

无锡惠山泥人是我国著名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类之一。惠山泥人大约自明代晚期始创，清乾隆年间，艺人王春林捏泥孩儿五盘入贡，得到清代乾隆皇帝赞赏。

早期惠山泥人以阿福、蚕猫、春牛等粗货为主，清代中期在昆腔等地方戏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了“手捏戏文”，也产生了周阿生、丁阿金等一批技艺超群的艺人，把惠山泥塑艺术推向历史的高峰。

这件彩塑即是惠山手捏戏文艺术的代表之一，表现的是“白蛇传·断桥”这一情节，青

蛇因许仙负义而拔剑欲杀之泄恨，白蛇却顾怜夫妻之情极力阻止，而许仙因惊恐、懊悔跌坐在地，戏剧矛盾冲突得到了集中展现。

这件作品由惠山泥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喻湘涟和王南仙共同创作。喻湘涟和王南仙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代惠山女性民间艺术家，喻湘涟工塑，王南仙擅彩，两位艺术家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联袂创作，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共同为传承发展惠山泥人艺术作出了突出贡献。

## 三块浮雕背后的革命故事

麦松强

耸立在苍松翠柏之中的南宁革命烈士纪念碑，始建于1956年，碑高25米，碑体南北两面铭刻着“革命烈士纪念碑”7个大字，东西两侧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纪念碑基座的南面刻有碑文，西、北、东三面镶嵌三块汉白玉浮雕，分别展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广西的重大历史事件。

### 第一块浮雕：点燃火种

1929年10月，邓小平、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教导总队3支武装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且群众基础较为深厚的左、右江地区，实现革命武装在时间与空间的转移，为中

国共产党建立红七军、红八军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坚实的政治、组织、军事基础，拉开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序幕。从此，广西革命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第二块浮雕：抗日救亡

抗日战争时期，南宁多次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南宁（含邕宁、宾阳、上林、横县、武鸣、隆安等9县）人民生命与财产遭受惨重损失，百姓流离失所、工厂倒闭、商业萧条等损失，无法估量。日军的暴行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在中共南宁地方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南宁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从未间断。

1939年11月，南宁战时工作团成立，在桂南战区组织当地人民群众成立抗日自卫

武装，坚壁清野，慰劳勤奸。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广西曾先后三次组织过学生军。广西学生军的组建，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产物。在学生军组建时，100多名中共党员，特别是学校的学生党员，秘密参加第二、第三学生军。在这4000多名学生军中，有90多名地下共产党员（占当时全省党员的1/10），他们是响应中共省工委的号召而参军的，同时也就带着党指示的任务而参军。广西学生军对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广西的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第三块浮雕：解放广西

1949年11月，解放广西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6个军、第二野战军3个军由湖南、广东、贵州分3路向

广西进军，围歼逃到广西的白崇禧集团。

与此同时，南宁党组织发动工人、学生护厂护校，全面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守护南宁。

南宁警察局、护商大队、华中长官公署直属工兵团、二二九师山炮连等部2000多人在其长官带领下投诚。工兵团封存准备用于毁城的数10吨炸药。警察局、护商大队的武装在南宁党组织的指挥下，担负起保护南宁、维持治安的任务，挫败敌特准备破坏电信局、水电厂及其他重要设施的阴谋。撤到南宁的银行经理也封存了全部资金等待人民的接管。

1949年12月4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开进南宁城区，南宁解放。11日解放凭祥，红旗插上镇南关，宣告广西解放，历史翻开新篇章。

无数先烈的奋斗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正如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所记：“八桂大地，山河壮美，世纪过往，英雄辈出。为争国家之独立、民族之解放、人民之幸福，广西各族烈士先贤，奋斗牺牲、卓绝前行。”

（作者单位：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 浮雕一



▲ 浮雕二



▲ 浮雕三

## 鹿角立鹤

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时期鹿角立鹤由鹤身、鹤腿、鹿角、底板榫接组成，其1978年出土于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

这件鹿角立鹤铜器鹤的头、颈与鹿角均错金装饰，背脊与双翅周边镶嵌绿松石（已佚），吻部右侧有“曾侯乙作持用终”七字铭文。出土时位于主棺之东。

中国古代视鹤、鹿为神鸟、瑞兽，此鹿角立鹤为鹿、鹤合体，颇为珍贵。

战国 鹿角立鹤 1978年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